

荀况人定胜天思想 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江苏省南通县兴仁公社六大队二生产队 马万明

在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上，围绕着“听天由命”还是“人定胜天”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站在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拼命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妄图借助上帝的权威来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没落奴隶制度。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并反映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法家荀况，以革命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举起了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旗帜，打击了儒家天命论。

在农业生产上，是鼓吹“天命”呢？还是强调“人定胜天”？这是儒法两家斗争的中心问题。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我国古来以农立国，农业收成的好坏是关系着人们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领域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得非常突出，非常激烈。从法家管仲、商鞅等实行变法，大力提倡“耕战”和儒家拼命反对变法，反对“耕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法家先驱者管仲说：“只有从事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多打粮食。粮食多了，国家才能富强；富强了，才能兵强。这样国富兵强，才能统一国家。”

（《史记·水地》）后来，李悝提出“耕”，吴起提出“战”。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商鞅进一步提出“耕”、“战”并举，明确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农战》）还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令民归心于农”（《垦令》）。而儒家一贯反对开荒，攻击“耕战”，拼命鼓吹“去兵去食”（《论语·颜渊》）的谬论。孟轲更是叫嚷“善于打仗的人是犯罪，要处以重刑；对开荒，把土地分给农民的人必须判罪”。（《孟子·离娄上》）

孔老二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需要，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耕也，馁在其中矣”。《论语·为灵公》孟轲叫嚣“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虽有镃耜，不如待时”。（《公孙丑篇》）他们为了“复礼”，死劲鼓吹“畏天命”以麻醉和瓦解人民的斗志，要人们做自然的奴隶，听从奴隶主摆布。荀况为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挺身而出，高举唯物论的战斗旗帜，向着儒家反动的“天命论”猛烈开火。他向奴隶制的旧世界宣战说：与其盲目地尊崇天而仰慕它，何不把它跟万物一样畜养控制起来呢！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何不把握它的规律去利用它呢！与其望天时而坐待恩赐，何不因时制宜而使天时而为农业生产服务！与其听任物类自然生长而增多，何不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使物类发生变化！与其空想役使万物，何不把万物管理好而不失掉它的作用！与其指望物类的自然发展，何不把握物类生长规律而促成它茁壮成长！荀况在否定天命论的基础上，强调人要与天作斗争，并且要征服自然界。他进一步指出：“天时”、“地财”、“人治”是可以掌握的，不掌握这些现实的东西，而去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就必然陷入迷惑状态。人们主要任务就是“制天命而用之”。（《天论》）

在农业生产上怎样“制天命而用之”？荀况指出，首先要敢于和大自然作斗争，用他的话说：“良农不为水旱不耕”（《修身》），要变水患为水利，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其办法是：“修筑堤岸和桥梁、疏通田间水道，在涨水的时候，使水能通行而不乱流成灾。水涸的时候，使水有所储藏而不漏竭。水闸的关塞都要合乎农时的需要。年岁虽有灾荒水旱，使百姓还是能够有所耕种和收获”。（《王制》）他吸取了先秦时期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了精耕细作夺高产，准确地指出了六个关键问题：

（1）抓紧时机耕作，千万不要耽误农时。用他的话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王制》）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丰衣足食，只有不违农时进行耕种，即“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这就是说，不要夺取人民的农忙时间做别的事，这样国家自然就富了。“勿夺农时”是他多次强调的，这是循乎事物规律的。否则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熬然（如受煎熬），若烧若焦（《富国》），要造成灾荒。

（2）要因地制宜种植作物。他说：看地势的高低，察土壤的肥瘦，根据黍、稷、豆、麻、麦五种作物的性质而依次去种植。（《王制》）

（3）注意深耕细作，及时中耕除草。荀况认为，粗劣的耕作要伤害庄稼，不及时锄草，田地要荒芜了。（《天论》）

（4）多粪肥田。荀况说：“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富国》）就是拔除野草来种植谷物，用大量的粪来肥田，这是农夫和众人的事情。他还提倡积绿肥，这就是“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致士》）

（5）兴修水利。他说：水利搞好了，可以“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

五谷以时应。”(《富国》)意思是使高地没有旱灾,低地没有水灾,寒暑气候调节适宜,五谷按时成熟,即使有水旱灾害,人们也可以战胜它。

(6)以粮为主,还注意林、牧、付、渔等多种经营:

首先要抓紧粮食生产。荀况继承了管仲“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国藩》)的思想,提出了“得后稷,五谷殖”。(《成相》)他进一步指出:“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件事不错过时候,所以五谷的生产不会断绝,而百姓也就都有余粮了。”(《王制》)

他提倡积极发展林、牧、渔业,修明有关火的法令(如焚山泽之类),培养山林和藪泽里的草木、鱼鳖以及各种蔬菜,规定按时采伐或者禁伐,使国家足够使用,财物不至竭尽。(《王制》)因为当草木正在发芽、开花长大的时候,就不能让拿斧子采伐木材的人进到林里去,以免夭折草木的生机,断绝草木的生长。斩伐和栽培林木都不能错过时机,所以山林里不至光秃秃地草木不生,这样,也就有用不完的木材了。他提倡当鱼鳖等正在产卵的时候,就禁止打鱼的网和毒鱼的药放到水里去,以免夭折鱼类的生命,断绝鱼类的生长。凡是污池渊沼川泽,都要严密地保护。(《王制》)

他提出要劝人饲养六畜,学习种植树木,还应“根据实际需要,发展实用的手工业生产,评比百工的巧拙,审查各种工事是否合时,辨别产品的精巧和粗劣,注意产品的完善和利便,以便储备应用,使那些雕琢文采不切实用的东西,不敢私自和在家制造”。(《王制》)

荀况总结了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并提出了农、林、牧、付、渔等多种经营的主张,是为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发展封建地主经济着想的。这对历史是有贡献的,大大促进了战国以后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也是深远的。但他受着阶级、历史的局限,在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下,其主张也是不可能完全实行的。

荀况批判了儒家“畏天命”和无所作为的观点之后,进一步指出:土地是可以生产五谷的,人们只要好好地治理它,一亩就会出产好几盆谷物,而且一年可以收获两次;瓜桃李每一棵所结出的果实,将会多到拿盆鼓来计量;葷菜(姜葱蒜)和一切菜蔬也会多到拿池泽作单位来计量;六畜禽兽大到每头装满一车;鼃鼃鱼鳖鲭鳢每一类都多到成群;飞鸟鳧雁多到象烟气籠罩着大海一般;此外还有昆虫万物生长其间。由此可知,供人食养的东西简直多到不可胜数,天地生万物本来是有剩余足以供人吃的,麻葛茧丝鸟的羽毛齿革,本来是有剩余足以供人穿的。因此,不够并不是天下人共同的祸患,天下共同的祸患是由“人妖”而来的。(《富国》)荀况把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孔孟的“畏天命”,指向没落的奴隶制度。荀况这种人定胜天思想,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起了一场大革命,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无神论对宗教迷信的一次胜利进军。从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总是宣扬“天定胜人”——天命论,荀况既承认了自然界的客观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正确地解决了天和人的关系。这一声音象晴天的霹雳,沉重地打击了

腐朽的儒家思想，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人定胜天思想的提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重大意义。列宁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的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来自自然界，依赖自然界。但是人把自然界作为客观的对象加以认识，加以改造，也就是说和自然界处于对立的地位。原始的人类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还不能将自己同自然界分开。孔孟之类的反动儒生，使人隶属于“神”的奴役之下，也使人永远成为自然的奴隶，从而也是奴隶主贵族的会说话的工具。荀况第一次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成为独立的力量，与自然界相对立，并征服自然界。这是荀况的历史功绩。荀况的人定胜天思想，奠定了法家“耕战”政策的理论基础。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人定胜天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富国以农”、“拒敌持卒”的耕战口号（《韩非·五蠹》），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武力是巩固政权的根本办法。新兴地主阶级由于实行了法家的人定胜天的耕战政策，迅速地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劳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掌握了铁制农具，不断地同地斗，同天斗，同自然灾害斗，变水患为水利，使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驰名中外的郑国渠，也是人定胜天思想结出的硕果。其渠长三百里，引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于是关中沃野无荒年。从此关中为秦国一大粮仓，对秦始皇统一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灵渠是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荀况人定胜天思想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本人研究了农业和蚕桑的生产经验，指出：“今天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益，一岁而再获之。”这精神今天仍适用。他在《蚕赋》中总结了劳动人民养春蚕的经验，写得生动而形象。“春蚕在气候闷热而湿度高时，易于发生疾病，到三眠后才长成。”他对蚕儿生长蜕变过程还有些模糊，所谓“蛹以为父，蛾以为母”，这是错误的，但其他说法都符合农业科学。特别是他概括了“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多粪肥田”等规律，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这是世界农学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农业百科全书。北魏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强调的“勤力可以不贫”；王充《率性篇》和南宋《陈甫农书》中的“地力常新论”；明代马一龙撰的《农说》中讲：“知力为上，知上次之，力足以胜天”等等，无一不是人定胜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在天文、农业气象方面，荀况和儒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孔孟大肆宣扬“天有意志论”，胡说什么陨星的坠落、树木的鸣叫、天气的干旱及日、月蚀的发生等等都是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预兆。荀况批判说：都不对。并指出：日蚀月蚀的发生，刮风下雨不合季节，怪星偶然出现，这是没有一个朝代不曾有过的。君主英明，政局安定，这些怪现象即或同时出现，也不会有什么危害。君主昏庸，政局险恶，即使这些怪现象一个都不出现，也不会得到安宁。所以天上星星的陨落，树木的声响，不过是天地、阴阳变化的一种现象，只是比较少见罢了。由于人们

认识的限制，不能科学地分析解释，觉得奇怪是可以的，觉得害怕就不对了。他进一步指出：看到日、月蚀便去敲锣打鼓抢救，碰到天旱便去祈祷求雨，决断大事就去卜筮，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真的能得到所乞求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人民的手法。人们根据客观规律办事，是可以胜天的。用他的话说：“认识天是为了根据观测的天象推测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地是为了根据土地条件来繁殖可以生长的农作物；认识四时季节是为了根据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来适时进行农事。所以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相信天命的人，才等待自然的恩赐。那些有作为的人，坚决按照自然法则办事，就能战胜天。”（《天论》）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荀况提出这些卓越的见解，是了不起的，这对我国天文学、农业气象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荀况为了“制天命而用之”，还最早提出了人要“善假于物”（《劝学》）的科学主张。他说：人的脚跑路不快，利用车马旅行，就能行走千里之外。人不会游泳，利用船和桨，就能横渡江河。人力不如牛，而能用牛耕田。这些叫做“善假于物”。荀况“善假于物”的思想，对机械的发明创造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通常所说的机械，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力量，或在我们自身以外假借一种其他动力——畜力、风力、水力、热力等，以帮助或者代替我们做工的机械。二千多年前荀况就能提出“善假于物”这样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明代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也是这种“善假于物”思想的发扬光大。《天工开物》全书共十八卷，附图二百余幅，分别叙述了我国古代有关粮食、纺织等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原理和制品工艺。宋应星把研究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特别注意总结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丰富经验，书里面有一半篇幅记载着我国古代的农业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全书闪烁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

总之，荀况人定胜天思想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

二

荀况毕竟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受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指出人定胜天的真正道路，也不可能看到胜天的真正力量是广大劳动群众。他始终跳不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圈子。例如，他认为，劳动人民只能“精于物”，掌握一些具体的劳动技术和零碎的生产经验，只有“君子”才能“精于道”，才能掌握客观规律。同时，还认为劳动人民只是出力干活的，被统治的对象，只有“君子”才“能群、善群”，才是社会的组织者，因而也是社会的统治者。这就否定了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也不可能把孔孟反动的天命观彻底批倒。

只有在现代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才可能从根本上说明人定胜天的革命意义，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学理论，抓路线，促生产，继承和

发扬了人定胜天的革命思想,掌握了社会 and 自然的发展规律,高度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治山、治水、改土造山,谱下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凯歌。大寨贫下中农在连续三年大旱面前,没有屈服于大自然的的压力,要做大自然的主人,他们高呼:“天大旱、人大干”的豪迈口号,用冲天干劲,同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大旱了三年,大干了三年,年年夺得了高产,粮食每年平均亩产都在千斤以上。全国广大贫下中农以大寨为榜样,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小靳庄大队的同志说得好:“我们不信天命,要革命”。广东省海南岛的屯昌县,山多水缺,过去十年九旱,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二百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县的广大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以人定胜天的思想,大干苦干,重新安排了山河,使革命和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粮食产量,一九七〇年亩产513斤,从一九七一年起连续三年超《纲要》,一九七三年虽然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灾和多次强台风的侵袭,亩产仍然达到893斤,总产量比1970年将近翻一番,油料、生猪、甘蔗、橡胶等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农田基本建设三年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解放以来二十多年完成工作量总和的一点八倍。现在不论是县城附近的平川,还是偏僻山区的黎村苗寨,处处是绿油油的良田,处处是清澈的渠流,真是百里渠道流清水,万亩荒坡变水田。这个深刻的变化从何而来?屯昌县人民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干部一批二干三带头,大干大批大干换来了新天地!现在他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正掀起一浪高一浪的改造山河的新战斗,从县委到群众,都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奋战三几年,把整个屯昌县建设成为“山顶林木成行,山腰油茶郁香,山坡大寨梯田,山下平整田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南通县兴仁、兴东两个公社部份地区,在一九七四年六月,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次大冰雹灾害,损失了棉苗达70%以上,广大干部、群众在上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社队的大力支持下,发扬“愚公移山”的苦干精神,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日夜奋战,移苗补缺,确保了全苗。使一九七四年仍取得了亩产皮棉143.7斤的好收成。

全国大寨式的县、社、队越来越多,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地区大量涌现。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的郊区变化很大,发展很快。黄河以北出现了一批高产过长江的县,长江以南出现了亩产超千斤的省,以及亩产一千六百斤以上的县,北方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些省,正奋发图强,夺得了较大幅度的增产。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历来认为不可种小麦的,现在不但种了,而且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去年也实现了全区粮食自给,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还出现了小麦亩产一千三百斤以上的高产记录。我国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的建成,奔腾呼啸的黄河被征服利用,最近辽宁省南部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战胜了地震灾害,发展了生产,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学生,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朝气蓬

勃地奔赴农村，上山下乡干革命，他们也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向江、湖、河、海要粮，变沙漠为绿洲，他们的豪言壮语是：

“高山上建起了新的家，云雾中开出了新的田。我们胸怀远大理想，把锦绣河山来描绘。狠批孔孟之道，猛斗旧传统观念，为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愿把青春献。”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了：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我国广大农村，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人定胜天”思想在到处开花结果。

“有比较才能鉴别”，我国在毛主席领导下，人民不信天命靠革命，国内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农业年年丰收。而帝、修、反统治的国家，有的虽然钢铁多、机器多，人民却到处在闹“粮食恐慌”饿肚皮。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好，社会主义制度好。

人能不能胜天？根本在路线。农民种地，天天同大自然打交道，实际上要解决的不单是人同自然的关系问题。搞社会主义大农业，首先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农村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高山才可能低头，河水才可能让路，农业才可能大上快上。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剥削阶级散布的天命论斗，不同小生产者无所作为的思想斗，不但生产上不去，而且必然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因此，我们学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精神，首先要学他们讲路线、抓路线这个根本。

有了正确路线，就有可能进一步发挥亿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大发展。现在，我们在农业战线上虽然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还必须再接再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挥人定胜天的精神力量，进一步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我们一定要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一定要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